

DENG XIAOPING DE FEICHANG ZHILU

鄧小平的



非常之路

路小可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DENG XIAOPING DE FEICHANG ZHILU

鄧
小平的
非常之路

路小可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能雄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朱启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的非常之路/路小可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

ISBN 7-01-003396-X

I. 邓…

II. 路…

III. 邓小平-生平事迹

IV. A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9409 号

邓小平的非常之路

DENG XIAOPING DE FEICHANG ZHI LU

路小可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55 千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01-003396-X/A·263 定价：13.00 元

顾 问：刘华清 李德生 黄 华

主 编：李力安

副主编：程中原 曹志为

FN81/2814

困境中的偉人

薄波



目 录

第一章 留学法国的磨难与奋起	(1)
一、未成年的赴法勤工俭学生	(1)
二、艰难困苦中的小个子	(3)
三、磨难中的奋起	(8)
四、从“油印博士”到出色的革命活动家	(10)
第二章 苏区之行的悲欢离合与政治上第一次起落	(15)
一、吊起脑袋干革命的中央秘书长	(15)
二、临危受命独领一方的中央代表	(18)
三、家庭、事业的双重悲剧	(24)
四、赤都书记与“邓、毛、谢、古”事件	(34)
五、遭批判、撤职、关押和离婚的厄运	(45)
六、厄运压不垮的坚定信念	(54)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与政治上第二次起落 ...	(60)
一、坚持原则、有胆有识的总书记	(60)
二、“左”倾迷雾又重来	(66)
三、总书记与党主席的分歧	(77)
四、持续升级的党内斗争	(89)
五、“文化大革命”狂飙骤起	(102)
六、批判、斗争，殃及子女	(111)
七、流放江西谪居的日子	(120)
八、六载劫难，一朝崛起	(134)

第四章 全面纠“左”的曲折反复与政治上第三次起落	(144)
一、肩负党和人民厚望的治国干才	(144)
二、“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151)
三、勇捅“四人帮”这个“马蜂窝”	(162)
四、全面纠“左”的伟大举措	(169)
五、政治上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177)
六、逆境下的伟人风采	(192)
七、三落三起,再创辉煌	(201)

第一章

留学法国的磨难与奋起

一、未成年的赴法勤工俭学生

1919年9月的一天,四川广安的船码头上走来了几位中学生,他们此行是去重庆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其中有个叫邓希贤的小个子,圆圆的脸庞上充满稚气,这就是当年的邓小平,此时他才15岁。一个15岁的孩子,要独自漂洋过海,远到异国他乡,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上学读书,这对许多慈爱的母亲是难以接受的。邓小平的母亲淡氏也不例外。她竭力反对这一决定,但最终经不住邓小平和父亲邓绍昌的劝说,含着热泪为儿子准备了行装。同行的有他的远房叔叔邓绍圣及同乡胡明德(亦名胡伦),都是邓小平在广安县中学的同窗。他们登上了一艘开往重庆的货船,沿着滚滚翻腾的渠江东下,穿过乱石险滩,向着目的地而去。

刚刚在中国兴起的赴法勤工俭学潮流又增添了一批弄潮儿。

1919年9月,设在重庆夫子祠内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校址现为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正式开学。教室即为祠内明伦堂前的泮池周围建造的几所简陋的房子,条件很差。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法语、中文、数学和工业基础知识。邓小平分在初级班,他在全校学生中年龄是最小的,加之其充满稚气的圆圆的脸庞和神态,

使得当时的同学对这位小同学有着相当深的印象。60年后,当年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原一机部顾问江泽民(原名江克明)回忆说:“邓小平同志稍晚时间也进入这所预备学校,他显得非常精神,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非常刻苦认真。”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学习,1920年7月19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生在重庆总商会举行毕业典礼。经过法国驻渝领事馆的口试与体检后,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生中的83名学生获准赴法。其中46人取得贷费生资格,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提供每人300元费用;余下的为自费生,由重庆工商界捐款资助每人100元,自筹200元,共300元。邓小平为自费生。

8月27日下午3时,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这80余名毕业生,整队出太平门,登上了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轮前往上海。

随着汽笛长鸣,“吉庆”轮起锚航行,船上的80余名川东子弟告别了故乡与亲人。此时,16岁的邓小平恐怕不会想到,他这一离去,再也没有重新踏上四川广安这片他度过少年时光的故乡热土。

经过8天航行,9月5日,“吉庆”轮平安抵达上海这一中国与国外通商通航的重要口岸。当时所有由华法教育会(法国政府与留法勤工俭学会合办的组织)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都首先汇集到上海,再由上海华法教育会安排赴法。上海到法国的邮轮每月一次航班,重庆的80余名学生到沪后,即由华法教育会安排他们住在“名利大旅社”。

9月11日,大雨如注,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冒雨来到黄浦滩的法兰西码头,乘小艇到杨树浦,登上了法国邮船“鸯特莱蓬”(André Lebom)号。倾盆大雨之下,同学们的衣服及行李都湿了,入秋

后的天气,使人感到凉意,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万里求学之雄心”。

邮船徐徐开动,万里远航开始了。眼看就要远离亲人,远离祖国了,许多同学抑制不住心中的情感,跑到甲板上,在大雨中无限深情地凝望着这块逐渐远去的土地,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渐渐地,船进入浩瀚无垠的苍茫大海之中。

二、艰难困苦中的小个子

10月19日,“鸯特莱蓬”号邮船驶入法国南部的重要港口马赛,历时39天,行程3万余里,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终于踏上了向往已久的法兰西的土地。华法教育会派人专程从巴黎前往马赛迎接这批新到的学生,次日发行的《小马赛人报》对此事作了专题报道,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下船后,邓小平他们当即离开马赛,乘汽车直赴巴黎。巴黎这座被称为“世界花都”的西方大城市的繁华与气派,在这些初来乍到的中国勤工俭学生的眼中充满了新鲜感和魅力,令他们惊叹不已,从而对即将开始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活寄予了更多的美好向往之情。

然而,法国的现状是什么样的?等待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命运又会是一怎么样呢?现实完全与勤工俭学学生美好的憧憬相反。

由于战时经济的刺激,法国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保持了表面的繁荣,市场商品需求和劳动力就业状况是比较好的。但自1920年下半年起,一股资本主义经济的“寒潮”悄然降临了。

首先是大战刺激起来的庞大军事工业无用武之地了,一系列部门要裁撤。其次是战时管制经济的政策法令失效,使得燃料、电力等资源严重短缺的矛盾暴露出来,阻碍着整个工业部门的生产发展,许多工厂全部或部分停产,使法国出现了大批解雇工人的浪潮。再者,数以几十万计的军人退伍,需要找工作安置。此外,法国政府财政紧张,迭加新税,增加货币发行量,使得法郎贬值,物价飞腾。以主食面包为例,一年时间涨价近6倍。其他生活用品及交通运输业等也相继涨价。整个法国经济呈现出萧条凋敝的局面。

在这股寒流的席卷下,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遭受的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面对来势汹汹的解雇潮,许多法国熟练工人都失去了工作岗位,无一技之长、语言又不通的中国学生又怎能找到工作呢?据粗略统计,1920年底,在法国的1000多名中国勤工俭学生中,有70%没有工作。

1920年10月21日,邓小平和邓绍圣等20名同学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卡尔瓦多斯的小城巴耶(Bayeux),开始了在巴耶中学的学习生活。这是一所市立中学,学膳费相对低些。当时巴耶中学有4个班,即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六班,其中第六班为附设的小学班,主要课程为法文、历史、算术、博物等。邓小平就在第六班补习法语。由于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中间,有较好的语言环境和较大的压力,所以经过不长时间,他的法语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尽管邓小平尽量节俭用度,但近5个月的学习生活费支出,使他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他不得不离开巴耶学校,回到巴黎西郊哥伦布华法教育会,希望得到一些资助或是找一份工作。邓小平当时绝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能进入法国学校了。从1920年10月底到1921年3月,不过5个月的时间,邓小平就不得不结

束了他在法国的上学生涯。

就在邓小平于巴耶中学求学期间,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生了一个重大波折。1921年1月,被勤工俭学生视为家长和救星的华法教育会先后发出两个通告,宣布从组织上和经济上与勤工俭学生脱离关系,从3月15日起,华法教育会不再对失去工作、无法生活的勤工俭学生发维持费。这些通告一发出,犹如晴天霹雳,把告贷无门的失工学生推向了绝境。

绝望而又愤怒的勤工俭学生再也无法沉默了,压抑在胸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们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联合会,发起了“反饥饿运动”。2月28日上午8时许,400多名勤工俭学生来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公使馆找来的法国宪警冲入学生群中,毒打学生,强行抓走学生代表。一位叫王木的学生因躲避警察毒打,被电车撞死。

“二二八”流血事件的发生,震动了法国。广大法国人民同情中国留学生的悲惨遭遇。法国政府一方面要顾及自己的面子,另一方面也怕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会危害到法国在中国的权益。于是,由法国政府出面,与中国驻法公使馆磋商,决定由双方共同筹措一笔款子,继续向失去工作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发每人每天5法郎的生活维持费。

经华法教育会介绍,4月2日,邓小平、邓绍圣和另外几名四川学生来到法国南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梭,进入施奈德钢铁厂做工。中国勤工俭学生不懂技术,只能做一般的散工,即杂工,劳动强度很大。邓小平被分配在轧钢车间。他的工作,就是在达40度以上高温的车间里,在被钢水映红了的热蒸汽中,用长把铁钳挟着数十斤甚至百余斤重的火红炽热的钢材拖着跑,每周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50多个小时,有时还要加夜班。可以想象,一个16岁

的身材矮小的学徒工,要做如此繁重的苦工,一定不堪重负。

勤工俭学的学生住在离工厂 20 里地的盖沙南宿舍,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大屋。宿舍设有食堂,可吃早晚二餐,中餐则只带面包在工厂吃,渴时饮点自来水,肉菜皆无。像邓小平这样每日只有 10 个法郎的学徒工,生活用度是十分拮据的。本来,中国学生到工厂做工,是想以勤工而达到俭学的目的。可是,繁重的苦工压得他们精疲力竭,低廉的工资更使他们连日常生活都不能支持。邓小平曾说过,他在克鲁梭拉红铁,作了一个月的苦工,挣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 100 多法郎。

如果说体力上的劳累和生活上的困苦尚能忍受的话,那么法国工头的欺辱歧视则令邓小平和同学们无法忍受。在每天的工作中,工头像影子一样跟在周围,不允许稍有休息。由于种种原因,在不到一个月内,做散工的勤工俭学生日少一日,邓小平也由于无法再忍受下去,于 4 月 23 日离开了施奈德钢铁厂。这样,邓小平到法国后最初的勤工实践,不到一个月即告结束了。短暂的劳工生活,使邓小平初次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亲身体验了劳工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在他本来十分单纯的头脑中,增加了许多从未有过的重要认识。

离开了克鲁梭,邓小平又回到巴黎哥伦布村的华侨协社,他还是希望通过华法教育会能找到一份工作,积攒些钱,完成重新进行学习的夙愿。但这时,法国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失业劳工再就业更为困难。失学、失业,贫苦无告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又涌到小小的华侨协社,人数近 500 人,人满为患,生存的环境坏到了极点。邓小平于 4 月 23 日离开施奈德钢铁厂到巴黎时,他口袋里的钱已经用光,他只得挤在华侨协社的人堆中,一边领取每天 5 法郎的维持费,一边等待继续做工的机会。邓小平正是在这惨不忍睹的环

境下,度过他 17 岁的生日。自 1921 年 4 月底到 1922 年 2 月,华侨协社一直是邓小平的安身之地。近 10 个月漫长的地狱般的生活,对 17 岁的邓小平来说,要有多么强的毅力来支撑。

即使在华侨协社里挤帐篷草地,啃半熟土豆的苦日子过得也不是安稳的。1921 年 6 月,北洋军阀政府为扩大内战,派专使到巴黎,向法国政府秘商借款 3 亿法郎以购买军火。消息传出后,旅法华工、华侨及勤工俭学生无不义愤填膺。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联合旅法华人团体,组织了“拒款委员会”领导“拒款运动”。8 月 13 日于巴黎召开的第二次“拒款大会”上,中国公使馆秘书长王曾恩遭到愤怒群众的一顿痛打,迫使他在拒款宣言上签字,拒款斗争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留法学生的正义斗争,极大地触怒了北洋军阀政府和法国资产阶级政府。9 月 15 日和 10 月 15 日,法国政府和中国驻法公使馆先后宣布停发中国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这样,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失工学生,再一次面临生活的绝境。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巴黎第十区有一家叫香布朗的专门制作扇子和纸花的工厂,要招收一批工人。这批走投无路的勤工俭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大有绝处逢生之感。一位叫罗汉的学生写道:“困难到了极点的勤工俭学生,忽然发现了这块新大陆,不管工资厚薄,只要他肯收,便是好路径了。于是一拥拥去了 100 多人。”

10 月 22 日,邓小平等 105 位勤工俭学生进入香布朗工厂,他们的工作是用薄纱和绸子做成睡莲花,然后把花缠在一根铁丝上,再贴上一个标签,上面写着“阵亡将士的遗孀和孤儿的作品”。这种产品是为在美国募集资金用的,一般由女工来做,工价很低,做 100 朵花才挣 2 个法郎。有些人熟悉了以后,一天可以做六七

百朵,便能挣到10多个法郎,似乎是可以借此糊口了。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做的这份工,只是一份临时性的杂工。11月4日,仅仅两个星期,这批活儿就做完了,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便被解雇了。

为了糊口,为了生存,邓小平和同学们四处努力寻找工作,不论轻活、重活或脏活、累活,也不论杂工、临时工或清洁工,碰上什么干什么,哪里有活就到哪里干,所得收入也只能勉强充饥。这种没有着落的不稳定的状况持续了3个月。邓小平后来曾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然而,这丁点食物与他身体生长高峰时期的迫切需要来说却显得太少太少了。邓小平认为,他身材矮小,可能与青年时代在法国经常吃不饱有关。

三、磨难中的奋起

在那备受饥寒与磨难的日子里,有些勤工俭学生意志悲观消沉,有些人自愿被遣返回国,逃离勤工俭学运动之外,个别的甚至因绝望而自杀。邓小平在磨难中却没有忘记出国时的初衷,没有忘记亲人的嘱咐和殷殷期望,咬紧牙根苦渡难关,拼命干活以求得生存。艰辛的生活实践,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锻炼出了他坚强不屈的性格和无坚不摧的毅力。

自1922年起,法国经济开始复苏,一些工厂恢复开工,就业机会有所增加。2月13日,邓小平来到位于巴黎以南的蒙达尼城夏莱特(Chalette)镇上一家专门生产各类橡胶产品的哈金森工厂,成为该厂的一名临时工。该厂当时实行10小时工作制,星期六工作半天,每周工作54个小时。新工人实行计时工资,学徒期每小时工资为1法郎,以后逐步增加,熟练后实行计件工资。邓小平很快

就熟悉了眼下的工作,最多时一天能挣十五六个法郎。

在这同时,通过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强烈呼吁和热心勤工俭学运动的人士的奔走,勤工俭学生在法国的真实情况引起国内人民的重视,有关方面筹集了一笔款子,分发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人均400多法郎。邓小平也曾写信回家,希望家中给他点支持。他的父亲邓绍昌卖掉一些粮食和田地,给他寄去一笔为数不多的钱。这样,邓小平有了上述两笔钱,加上他在哈金森工厂做工的积蓄,求学的愿望又在他的心头强烈起来。

10月17日,邓小平辞去哈金森工厂的工作,并于11月3日离开了夏莱特,去塞纳河上游的小城夏狄戎,目的是进入当地的塞纳中学。邓小平此行未能如愿,原因是他手中的钱太少。这次求学不成,使邓小平在法国继续读书的幻想最终破灭。他后来回忆说:“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两个月后,即1923年2月2日,邓小平回到哈金森工厂,在制鞋车间又做了一个多月的工,于3月7日再次离开该厂,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一个极为重大的转折。

原来,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不少在国内经受过“五四”爱国运动洗礼的先进分子,如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刘清扬、王若飞、李维汉、向警予等,他们带着振兴苦难的祖国的雄心壮志来到法国,又亲身感受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黑暗现实和遭受了种种打击,使他们“科学救国”的幻想破灭,经过“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1921年9月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等斗争的实践,越来越多的勤工俭学生擦亮了眼睛,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3月,赵世炎、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陈公培等5人秘密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年底,赵世炎与在法国、德国和比

利时的周恩来、李维汉、刘伯坚、王若飞、傅钟等频繁联系，商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事宜。次年6月，这一组织在巴黎郊区布罗尼森林正式诞生了。这便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一成立，就在勤工俭学生中开展活动。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邓小平来到蒙达尼附近的哈金森工厂做工时，这里是勤工俭学生云集之地，聚集了一批先进分子，邓小平耳濡目染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2年夏天，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他一起举行入团宣誓的，有蔡畅等人。从此，邓小平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历尽70多年的岁月，无论是从事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在枪林弹雨中的战场，还是屡屡遭受革命队伍内错误路线的严重打击，邓小平都始终不渝地信守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

四、从“油印博士”到出色的革命活动家

1923年6月11日，邓小平按照团组织的指示，离开了夏莱特来到巴黎专职从事旅欧团支部的工作，同时做一些临时性的杂工以解决生活问题。

邓小平到巴黎，正逢旅欧团组织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周恩来被推选为书记局书记，李富春负责宣传。19岁的邓小平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成为旅欧团组织的对外理论刊物《少年》（后来易名为